

## 從權力舞台到藝術場域：羅浮宮的前世今生（上）

馬藤萍

### 前言

擁有八百餘年歷史的羅浮宮，作為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的羅浮宮，不同於多數歐洲博物館的成立，源於大量的私人蒐藏，羅浮宮則是由皇宮轉為藝術場域一特殊案例。因此，在羅浮宮八百餘年的歷史中，人們看見的不僅是羅浮宮的轉變過程，它更可被視為法國歷史的縮影，與各時代的社會與政治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### 從防禦城堡到皇室居所

法國羅浮宮的興建起源於十二世紀末的1190年，當時的法國國王腓力二世(Philipp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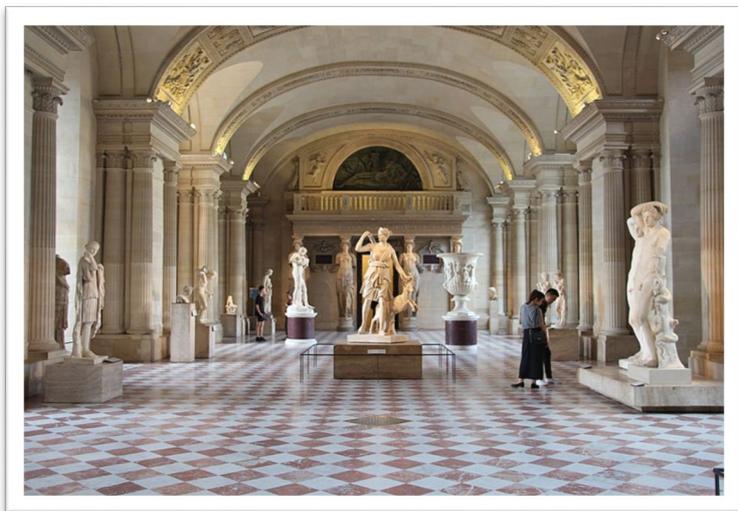


圖一：當今羅浮宮的「鐘閣」(Pavillon de l'Horloge)展廳內參觀其作為防禦城堡的歷史遺跡，而「聖路易廳」也保留在其中。(圖片來源：<https://reurl.cc/YdQoga>)

II)，計畫為巴黎的打造防禦工事，下令自塞納河(Seine)右岸的築起城牆，於下游處建立一座具軍事防禦功能的「羅浮宮城堡」(Château du Louvre)，並同時設置監獄。而至路易九世(Louis IX)時，則進一步將城堡內，其餘未有特定用途的閒置空間，用以存放皇家財寶，後世便將其稱作聖路易廳(Salle Saint-Louis)。此型態的羅浮宮維持百餘年，而其遺址位於現今羅浮宮建築群中，最後端的方形庭院(Cour carée)亦被稱為舊羅浮宮(圖一)。

十四世紀中葉，隨著巴黎市的擴張，羅浮宮的軍事功能被新建的城牆取代，於是當時的查理五世(Charles V)，將羅浮宮改作王室居所(Palais du Louvre)，成為第一個人住羅浮宮的法國國王；而為了將這座防禦城堡，修建為適宜的住所，查理五世再對羅浮宮進行擴建工程，並設置一座名為獵鷹塔(Tour de la Fauconnerie)的新建築，作為國王藏書手稿的蒐藏地，共計九百餘冊的手抄古籍運藏至羅浮宮<sup>1</sup>，它們既是羅浮宮的首批藏品，獵鷹塔也成為了查理五世在位期間的皇家圖書館(法國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的前身)。

但隨著繼任者查理六世(Charles VI)再次將居所遷離羅浮宮，就得等到十六世紀的法蘭索瓦一世(François I)，羅浮宮才又重新成為皇室居所才。法蘭索瓦一世不僅委派了知名建築師萊斯科(Pierre Lescot)，在 1527 年開始羅浮宮的整建計畫：將獵鷹塔拆除，修復羅浮宮因英法百年戰爭(Guerre de Cent Ans)造成的損害，並按照當時流行的文藝復興建築風格，改造羅浮宮的外觀，再由當時知名的雕塑家古戎(Jean Goujon)進行內部裝修。這項大工程直到 1551 年，在法蘭索瓦一世的繼任者亨利二世(Henri II)任內完成整建工程；而由於兩位設計者將新式的文藝復興風格融入法國建築的此一創舉，不僅為當時已有三百年歷史的羅浮宮，帶來了新樣貌，更使它成為法國文藝復興(Renaissance française)時期的代表建築。時至今日，萊斯科的部分建築仍受到保留，遊客可以在卡婭第德廳(Salle des Caryatides)<sup>2</sup>(圖二)看見當時的設計形式。



圖二：今日的「卡婭第德廳」。(圖片來源：<https://reurl.cc/de8oY8>)

隨著亨利四世(Henri IV)上任後，他也在 1595 年至 1610 年間，進一步修建了連接羅浮宮與杜樂麗宮(Palais des Tuileries)之間的大長廊(Grande galerie)通道，大幅增加了羅浮宮內部空間的運用，亨利四世也開始招攬畫家、藝術工匠進駐，並允許貴族同住羅浮宮內，促使藝文活動逐漸於該空間內形成。

### 國王的藝術蒐藏空間

羅浮宮藝術功能的奠定，除了查理五世的皇家圖書館，更仰賴於崇尚藝術的法蘭索瓦一世與後來路易十四(Louis XIV)等國王的入住，進一步將羅浮宮布置為他們的藝術空間，從而影響了羅浮宮的功能定位。

首先，除了入住羅浮宮並進行整建外，法蘭索瓦一世也開始在內部放置他的蒐藏，累積了不少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品，且諸多作品至今仍展示在羅浮宮內，如：國王先後向達文西(Leonardo da Vinci)及其弟子所購得的



圖三：藏於羅浮宮的達文西畫作《美麗的費隆妮葉夫人》。(圖片來源：<https://reurl.cc/NGD8Lp>)

六幅畫作<sup>3</sup>(圖三)，使得羅浮宮成為當今擁有最多達文西油畫創作的博物館。此外，法蘭索瓦一世當時頗負盛名的藝術贊助者，不僅享有「文藝復興的國王」(Roi de la Renaissance)<sup>4</sup>的稱號，他也因贊助了多位知名藝術家，如：米開朗基羅 (Michelangelo)、提香(Titian)與拉斐爾(Raffaello Santi)等，進而獲取他們的創作，為羅浮宮增添了不少藝術傑作。

到了十七世紀，同樣熱中藝術蒐藏的路易十四，成為了繼法蘭索瓦一世後，另一位對羅浮宮藝術發展有著絕對貢獻的法國國王。在空間上，路易十四整建了連接大長廊與舊羅浮宮之間的小畫廊(原由查理九世所建造)，並由知名的宮廷畫家勒布朗(Charles Le Brun)，以巴洛克藝術風格繪飾內部，將之打造為國王的接待廳，兼具藝術展示功能，並更命名為「阿波羅廳」(Galerie d'Apollon)(圖四)，以呼應路易十四的「太陽王」(Roi Soleil)稱號。而事實上，在羅浮宮轉變為公共博物館的這



圖四：今日的「阿波羅廳」。(圖片來源：<https://www.keepcalmandwander.com/apollo-gallery-is-the-most-dazzling-hall-at-louvre-museum-paris-france/>)

段期間，除了藝術藏品的累積，對該空間的打造也十分重要，而阿波羅廳的出現，也因其富麗的藝術裝潢與壁畫，被視作國王統治權的榮耀象徵，同時凸顯了當時由統治階層所獨斷的藝術權利<sup>5</sup>。

在蒐藏方面，路易十四也更有計畫性地進行藝術蒐購，他所任命的大臣也都有著相同愛好，像是在前朝首席大臣黎塞留(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)逝世後，他豐富的私人藏品部分轉存於羅浮宮，其中便包含了米開朗基羅的兩尊雕塑《叛逆的奴隸》(L'Esclave rebelle)與《垂死的奴隸》(L'Esclave mourant)(圖五)，以及普桑(Nicolas Poussin)的《酒神節與演奏琵琶的女人》(Andriens ou les grandes Bacchantes avec une femme jouant du luth)等名作。而繼任的首席大臣馬札漢(Jules Mazarin)同樣擁有大量的藝術藏品，路易十四



圖五：左起《垂死的奴隸》、《叛逆的奴隸》。(圖片來源：<https://panoramadelart.com/analyse/esclave-mourant-et-esclave-rebelle>)

也在他過世後，收購了部分的重要畫作，如：義大利的拉斐爾、柯雷吉歐(Antonio Allegri da Correggio, 1489-1534)、德國的版畫畫家貝哈姆(Sebald Beham)，以及「荷蘭黃金時代繪畫」的代表人物林布蘭(Rembrandt)等名家的畫作，它們至今仍為羅浮宮的重要展藏。

## 展示功能形成

路易十四在位期間，羅浮宮的藝術價值大幅提升，除了歸因於國王的私人蒐藏，以及藝術與學術機構的進駐；另一方面，憑藉彼時財政大臣柯爾貝(Jean-Baptiste Colbert)的主導，為進一步鞏固皇室對法國藝術發展與教育的支配，柯爾貝對法國皇家繪畫與雕刻學院(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)內的成員及其作品，制定了嚴格的審核標準，並建立「作品討論會」(Conférences)與「沙龍展」(Salon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)。而對於諸多藝術制度與相關活動的建立目的，事實上也側面反映了皇權對藝術教育的控制<sup>6</sup>。

另一方面，自從路易十四在 1682 年遷居新建的凡爾賽宮(Château de Versailles)後，遭閒置的羅浮宮就變成了藝術家的創作空間，他們得以鑑賞與研究國王所遺留的大量藝術畫作，且隨著法蘭西學院(Académie française)以及法國皇家繪畫與雕刻學院相繼於 1672 年與 1692 年進駐後，羅浮宮逐漸成為法國藝術體系的發展核心，而原為評鑑學員畫作所舉

辦的「沙龍展」，也在 1699 年首次移至羅浮宮的方形展廳內進行展示。儘管初時僅開放給王公貴族參觀，但到了 1737 年後，「沙龍展」轉為定期舉辦且向大眾開放的藝術活動。對於當時的法國人民來說，「沙龍展」的開放，意味著藝術自此逐漸進入公眾的日常生活；而對於羅浮宮來說，隨著逐漸確立的藝術蒐藏與展示功能，乃至於觀眾的出現，無不使它逐漸成為一座名符其實的「博物館」。

## 中央藝術博物館

隨著十八世紀末，法國大革命(Révolution française, 1789-1799)的爆發，不僅動搖了法國乃至於歐洲的政治體制，也促使羅浮宮博物館的誕生。在思想上，由於〈人權與公民權宣言〉(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'homme et du citoyen, 圖六)的出現，刺激了民眾對文化藝術的參與<sup>7</sup>。更進一步地來說，隨著君王體制的推翻，以及人權觀念的出現，政治、法律、財富，乃至於知識教育與文化藝術，過去由統治階層所把持的各項權力，受到了社會大眾的挑戰，從而催生了公共、公開展示空間的創建，人民開始獲得親身欣賞的權力，展示藝術的服務對象由皇室貴族轉為社會大眾，藝術與知識的啟迪便不再僅為少數人所享有。

首先在制度上，1791 年 5 月 26 日，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國民議會即通過了羅浮宮的開放法令，<sup>8</sup> 該年的 9 月 19 日，法國政府也再

頒布了「將皇室居所的藝術文物和紀念雕像有關的藝術品搬移至羅浮宮內」(Décret ordonnant le transport dans le dépôt du Louvre des tableaux et des monuments relatifs aux Beaux-Arts se trouvant dans les maisons royales)一命令，徵收皇家與教堂等各地的藝術文物，並集中放置於羅浮宮。最終在 1793 年 8 月 10 日，為慶祝推翻君主舊制一週年，臨時政府正式將羅浮宮改名為「中央藝術博物館」(Muséum central des arts de la République)並開始對外開幕。初時，羅浮宮的開放時間以十天為週期，前六天的參觀對象為藝術家與外國人，後三天才開放給法國國民，第十天則進行閉館清潔；直至 1794 年，羅浮宮才改為每日向公眾開放。

另一方面，隨著拿破崙(Napoléon)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崛起，並開始帶領軍隊向外征戰



圖六：於 1789 年 8 月 26 日所頒布的〈人權與公民權宣言〉。(圖片來源：<https://panoramadelart.com/analyse/esclave-mourant-et-esclave-rebelle>)

起，法國開始在歐洲各地獲得了大量的藝術品。自法軍在 1796 年的義大利戰役(Campagne d'Italie)<sup>9</sup> 取得獲勝後，作為此戰役總司令的拿破崙，便藉由與各戰敗國商討停戰協議而落奪藝術品，如：於同年的 6 月 23 日，拿破崙與當時教皇國(États pontificaux)的主教庇護六世(Pie VI)，共同簽署了〈波隆那休戰協議〉(Armistice de Bologne)，教皇國因此繳交了一百件藝術品和五百件手稿；以及於 1797 年，拿破崙同樣與威尼斯共和國簽署了一份秘密協議，後者需交付二十幅畫作和六百份文獻手稿<sup>10</sup>。

因此，在拿破崙席捲歐洲期間，自各地掠奪而來藝術文物，以及古希臘與古羅馬時代的雕塑等，便逐批存放在羅浮宮內，這樣的作法不僅成功形塑了法國轉為共和政體後的威望，透過蒐羅並展示外國傑作，不僅能強化公眾對新政權的認同，讓當時的法國民眾得以藉此一睹外國名作，同時也剛好彌補了法國在大革命期間所損失的藝術品<sup>11</sup>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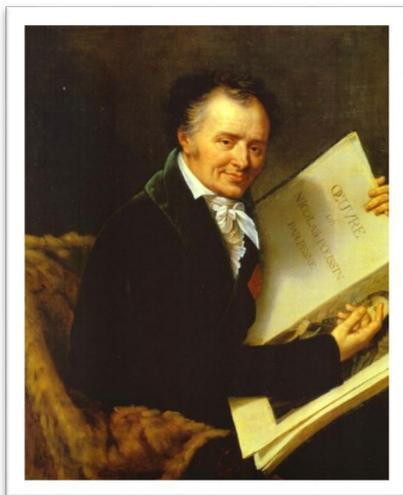
## 拿破崙博物館

隨著法國大革命進入尾聲，拿破崙逐漸掌權之際，他便在 1802 年任命了德農(Dominique-Vivant Denon)(圖七)男爵來掌管「中央藝術博物館」，成為羅浮宮的首任館長；到了 1803 年，拿破崙進一步將羅浮宮改名為「拿破崙博物館」(Musée Napoléon)，使

其原先所表徵的法國榮耀，轉變為對拿破崙政治合法性的強化。而德農作為羅浮宮的第一位館長，他也開始發展羅浮宮的博物館經營模式，並憑藉同樣有著對藝術蒐藏的愛好，以及豐富的博物館學與藝術史等專業知識，德農透過管理由拿破崙征戰所獲的各國藝術品，藉此實踐他對藝術機構經營、典藏乃至於展覽陳設的藝術理想，企圖打造一座擁有各國名作的世界性博物館，德農就曾說道：「我們在漫步(羅浮宮)過程中，就可以欣賞到一部繪畫史。」<sup>12</sup> 因此，在德農管理羅浮宮期間，他也再次翻新了羅浮宮內的大畫廊、增設新的展廳、開放古代文物，建立系統化的展出形式，並定期更換展品，更於羅浮宮內舉行節慶等，大幅提升了該場域的社會價值，加深了羅浮宮與法國人民的情感連結。

另一方面，德農也曾多次跟隨拿破崙的軍隊遠征，並負責接收戰敗國的藝術文物，像是在 1798 年的埃及戰役(Campagne d'Égypte)

後，德農與當時的「科學與藝術委員會」(Commission des sciences et arts)親赴埃及進行考古挖掘，促使讓羅浮宮的蒐藏範圍，再擴張至埃及與非洲等地區的古文明文物，而得以在 1826 年創立「古埃及部門」(Département des antiquités égyptiennes)(圖八)，同時更帶動了歐洲各國相繼前往東方地區從事相關的考古活動，自埃及乃至於中東地區與中南美洲，皆出土了多個古文明的大量藝術文物，促使埃及學(Égyptologie)、考古學(Archéologie)等研究學門的建立。其中，現轉藏於大英博物館的《羅塞塔石碑》(Pierre de Rosette)便是該次考古行動的成果，而著名的法國歷史家商博良(Jean-François Champollion)(圖九)也成功在 1822 年破譯這塊碑文上的埃及象形文字，並被任命為羅浮宮古埃及部門的首任管理者。至此，羅浮宮內的藏品已不限於古典主義與文藝復興的藝術畫作，隨著拿破崙征戰歐洲各國，以及進軍埃及後興起的考古研究，陸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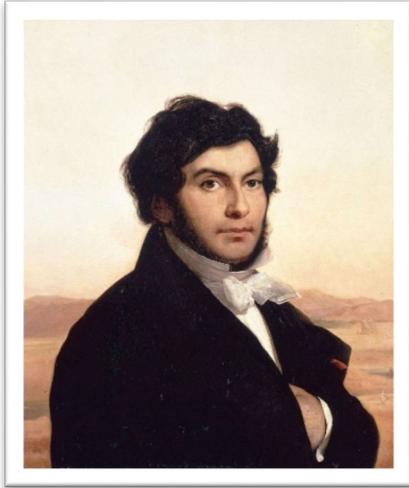
圖七：德農畫像。(圖片來源：<https://panoramadelart.com/analyse/esclave-mourant-et-esclave-rebelle>)



圖八：今日的古埃及展區。(圖片來源：<https://www.atile.fr/architecture/musees/antiquites-egyptiennes-musee-du-louvre-105.php>)

出土的大量古文明文物，而後復辟時期的查理十世(Charles X)，亦陸續收購考古文物，不斷替羅浮宮的新部門增添藏品。

可以說，在拿破崙崛起並掌權的 1797 年至 1815 年間，舉凡畫作、雕塑、考古文物與



圖九：商博良畫像。(圖片來源：<https://reurl.cc/10zWRX>)

文史檔案等，甚至礦物和植物等自然資源，皆在法國以建構羅浮宮之名義下，成為拿破崙軍隊的蒐藏目標。直至 1815 年拿破崙退位時，為解決他所帶來的侵害而召開維也納會議(Congrès de Vienne)，也進一步提出了法國當局對歐洲藝術品的歸還事宜，當時「拿破崙博物館」內的兩千餘件畫作、百餘座雕塑、青銅器等藝術文物，陸續被返還至歐洲各國；但事實上，仍有不計其數的歐洲藝術品被留置法國，甚至遭遺失或破壞。

(下期待續)

(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法文系碩士班畢業生)

註釋：

1. 周功鑫，〈羅浮宮與羅浮宮博物館〉，故宮文物月刊，第 13 卷第 7 期，1995，頁 127。
2. 卡婭第德廳位於蘇利館 (Aile Sully) 內，主要展出古羅馬時期的藝術雕塑。
3. 分別為《蒙娜麗莎》(La Joconde)、《施洗者約翰》(Saint Jean-Baptiste)、《岩間聖母》(La Vierge aux rochers)、《聖母子與聖安妮》(La Vierge, l'Enfant Jésus et sainte Anne)、《美麗的費隆妮葉夫人》(La Belle Ferronnière)，以及被認為僅有底稿出自達文西之手的《巴克斯》(Bacchus)。
4. Columbia Encyclopedia, "Francis I 1494–1547 King Of France".  
參考自：<https://www.encyclopedia.com/humanities/encyclopedias-almanacs-transcripts-and-maps/francis-i-1494-1547-king-france>
5. Carol Duncan, "Ritual in the early Louvre Museum",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Nation-Building, London: Routledge, 2013, p. 94.
6. 劉碧旭，《觀看的歷史轉型》，臺北：藝術家，2020，頁 72。
7. 李軍，〈地域的中心化：羅浮宮與普世博物館的生成〉，文藝研究，第七期，2008，頁 15。
8. Jean-Marc Léry, "Le Louvre du Palais Royal au musée national", Patrimoine parisien 1789-1799. Destructions, créations, mutations, Délégation à l'Action Artist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,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, 1989, pp. 96-101.  
參考自：  
[https://fr.wikipedia.org/wiki/Mus%C3%A9e\\_du\\_Louvre#Mus%C3%A9e\\_central\\_des\\_arts\\_de\\_la\\_R%C3%A9publique](https://fr.wikipedia.org/wiki/Mus%C3%A9e_du_Louvre#Mus%C3%A9e_central_des_arts_de_la_R%C3%A9publique)
9. 發生於 1796 年至 1797 年，戰敗國為義大利境內的教皇國、威尼斯共和國，以及反法同盟的成員國等。
10. Sabine Lubliner-Mattatia, "Monge et les objets d'art d'Italie", Bulletin de la Sabix, 2007, 41, p.1.
11. Dominique Poulot, Patrimoine et musées: L'institution de la culture, Paris: Hachette, 2001, p.67.
12. 李軍 (2009 年)，頁 18。